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程中原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一二·九”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的法宝。中共中央在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即提出“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拥蒋抗日”。在西安事

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在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公开地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全国的、群众性的党。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发动、组织和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这一光辉业绩将永远彪炳中华民族的史册。

落脚陕北: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 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华北,中华民族十分危急之时。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的希望,提出了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任务。

193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①在通渭城撰文指出: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动“将引起国内外关系的变化”。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群众中正酝酿着反抗日本侵略的怒火。文章宣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将“更高的举起反日、

① 张闻天的任职,采用邓小平的提法。邓小平在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反帝的旗帜”，“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① 10月18日，在铁边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指出，现在长征的任务已完毕，“必须提出新的形势，新的任务”。^② 10月22日，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指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的任务就是“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③

按照11月3日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分成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到前线；张闻天、博古率中央机关北上在后方。张闻天等于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11月13日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成为“反日反蒋的根据地”，进而“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④ 在这里，已经将原来的“反帝”和“反日、反帝”并提的提法改变为“反日”和“反日反蒋”；“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明确地解释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战略目标已经逐渐向当前最主要的敌人集中。

11月13日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

① 《察哈尔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吞华北》（1935年10月1日），载《前进报》第4期，署名洛甫。

② 1935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藏。

③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④ 引自《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该书据1935年11月13日西北中央局会议记录。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对外称中共西北中央局，故中共西北中央局会议实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以《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的决定》。文件指出：“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就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文件还着重提出了策略路线问题。重申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在1933年1月“共同抗日三条件”之下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强调要运用1934年4月发表的对日作战“六大纲领”并使之具体化与实际化。文件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作出了新的界说，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斗争方式”“都应该用来”抗日反蒋。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基本方针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中国共产党还是将“抗日”和“反蒋”这两个口号并提，但是已经将“抗日”摆在第一位了。

过了4天，11月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①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为了达到“抗日”这个崇高的目的，张闻天明确提出要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重点对象是同蒋有矛盾的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文章还鲜明地提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要求党和红军在灵活运用广泛统一战线过程中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就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独立作出判断，启动战略转变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被派遣回国于11月18日或19日到达瓦窑堡。他立即向张闻天传达了国际“七大”关于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建立反法

^① 载《斗争》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

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八一宣言》关于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等内容。张闻天即同张浩和在后方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认真研究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依据当时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动的实际情况,作出战略、策略转变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张闻天接连写信、发电报给在前线的毛泽东,告知张浩传达的要点及准备进行的策略转变与拟定的相应文件,征求毛和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

193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作了报告和结论。^①同时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②,并为此写了《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一文。^③这些文件,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的阐述,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首先,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环子”。这一“新的步骤”,扩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提高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第二,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行动方针。第三,强调“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提出对于敌对的军阀、政治派别可以不念旧恶;同英、美帝国主义可以建立友谊;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即使“只

① 根据会议记录整理的文本,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为题首次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抗日救国宣言》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的。其时毛在直罗镇前线,朱还在长征途中。毛12月1日复张闻天电中有“宣言请立发”句,而在这之前,张于11月20日和25日两次派人送专函告毛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内容等。从现存毛、张来往电文看,《宣言》当是张草拟后送毛征求意见取得同意后发布的。电文均藏中央档案馆。

③ 此文写于1935年12月1日,发表于《斗争》第76期(12月5日),署名洛甫。部分内容以《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全文重新刊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

反日不反蒋”“也可以”。统一战线的中心目标、指导思想更加明确。第四,系统分析了关门主义的特点、表现、产生原因及危害,提出“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

为采取实际步骤纠正过去“左”的政策,实现策略转变,张闻天于12月6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纠正过去“加紧反对富农”的“左”的办法”,以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规定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在白区,“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改变对富农策略成为此后各项具体政策转变的开端。

上述事实说明,党中央从落脚陕北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已经逐渐明确,重大的政策改变已经开始,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已经拉开。

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式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式确立,是通过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具体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从中国实际出发,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瓦窑堡会议决议》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外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完整的分析,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决议》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单独吞并中国”,这一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空前紧张,引起了中国各阶级、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

有“直接参加”反日战线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此，必须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决议》对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作出新的解释：“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最广泛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实行十大政纲”，并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决议》要求全党“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中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去取得民族革命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的方针，指出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

自红军落脚陕北以来，两个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发扬民主，集中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正确地分析新的形势，提出新的战略任务、新的策略路线和新的方针政策，并把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及时地、逐步地推动了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为瓦窑堡会议的胜利召

开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而《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两个月来为实现战略、策略转变所作一切的系统概括和充实发展。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本确立。

瓦窑堡会议结束，12月27日，中共中央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要准备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接着，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开会，研究确定北方局、东北军、组织、工会、少共等各方面工作部署和政策转变，并决定红军渡黄河东征的作战方针和组织领导。

总之，在瓦窑堡会议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政治策略与军事行动都作了一系列部署，促使各项工作实行新的政策，自觉地转变到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新的路线方针上来，为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臻于完善

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将“抗日反蒋”作为基本方针。抗日和反蒋并提，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奉行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而对共产党和红军，则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反复进行“围剿”。在当时，把蒋介石视为主要敌人，实在是势所必然。然而，中国共产党是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点在于抗日。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并不决定于中共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蒋氏之是否抗日。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野心直接危害和威胁英美等国和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利益。蒋氏为维持其统治,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上,蒋表示要改变其妥协退让政策,并有实际行动。对外,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对内,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寻求同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既然蒋氏向抗日的方向动摇,中共领导人立即主动地、适时地调整对蒋策略,把“抗日反蒋”和“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和“民主共和国”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以对蒋方针为关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臻于完善。

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从1936年初就已开始酝酿。在1月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对蒋的分析和“不同意讨蒋”^①的意见,引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2月27日,受托为南京方面送密信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同张子华一起到达瓦窑堡,传递了国民党要求同中共谈判国共联合抗日问题的信息。这就更为直截地把“抗日反蒋”是否继续并提的问题提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促使中共及时改变对蒋方针。

3月4日,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复电,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点意见。接着,3月下旬晋西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就没有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而强调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

^① 据1936年2月20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给李克农的训令,转引自《张闻天传》第375-376页。

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① 所以，即使在蒋介石派十个师兵力到山西阻拦红军的情况下，回到后方的张闻天和仍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都认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而是讨日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也不提“讨蒋”、“反蒋”口号，呼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甚至有“促进蒋介石氏……最后觉悟”的期望。然而，蒋介石却把中共和红军回师河西所显示的团结抗日的诚意作软弱的表现，错误地认为正是他用武力消灭红军的机会。蒋不仅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而调兵遣将，合围、进剿苏区和红军。所以，东征回师后，中共领导人仍然将东北军和国防政府视为“全局关键”，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确定为“现在中心”^③，并继续执行“抗日反蒋”方针。这实在是被蒋所逼，不得不然。

6月“两广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关系出现转机。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而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在各种压力下，蒋的内外政策不得不有较大改变。对外，表示不再继续其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对内，表示愿与中共商谈联合以至利用统一战线的意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于8月收到南京方面的来信，提出国共谈判的新的4个

① 转引自《张闻天传》，第377页。

② 引文出自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洛甫电，该电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3期，该电文未说：“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

③ 引语见毛泽东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条件。^①“八月来信”所提4条同5月间所提4条^②有较大变化,其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要点为: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

就在此刻,潘汉年于8月8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保安。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在5月间离开莫斯科到达香港。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潘7月先在香港后到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会晤。南京方面希望潘速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亦即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的答复),再到南京商谈。潘到达保安后,立即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香港、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等)。

南京方面急于要得到对新4条的答复,促使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断。8月10日,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实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治局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

① 提出新4条的南京来信,其文本至今未见,但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说到此信内容。本文以下所述新四条的要点,即从这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摘录,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1936年5月中旬,上海中共特科的张子华第二次到陕北,带来谌小岑以个人看法名义转告的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四项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据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①

关于对蒋的具体策略,当时在政治局内意见还是不尽相同的。一种意见主张在“联蒋”的同时还要“倒蒋”,“从政治上去击塌他”,使蒋“完全瓦解”、“完全破产”。另一种意见不同意采取“倒蒋”的策略。认为现在蒋介石、南京政府“战术有许多变动”,策略上“开始表现他的动摇”,“但不能说是基本的改变”。基于这样的估计,我们的策略应该“不仅揭破他的欺骗,而且更要推动他的动摇”。就是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倾向抗日的一面继续发展,推动他进一步转向真正抗日。

8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与会的8位政治局委员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会议决定的今后战略方针。^②电文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电文还提出“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并说明现在实行的所有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这份电报就是会议决定要写的“秘密信”,是在党内、军内传达八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第一个文件。接着,毛泽东、张闻天又起草“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秘密文件”

① 据 1936年8月10日政治局会议记录,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电文收入《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04页。

《中共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正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通称“国际电报”)。^①“国际电报”指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际电报”对“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的电报^②中说到,八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南京方针,“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又说,“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得到“国际电报”以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性质更加明确了,对南京方针就“完全转变过来”了。^③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接读“国际电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对已经起草好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作必要的补充后,立即于8月25日发出。这封信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内容。

在这封信里,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庄严宣告: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

① 这份电报通称为“国际电报”或“政治指示”。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首次公布。《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中译文。收到时间“8月下旬”据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该电说到“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

② 该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③ 见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令部的指挥。并明确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致国民党书》实际上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中提出的统一条件作了公开的答复。

8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至于用什么口号来代替“抗日反蒋”，语言一时没有确定。鉴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蒋逼迫的过程，在8月30日的一份电报中对蒋新方针第一次用“迫蒋抗日”来表达。^①9月1日在党内发布的指示，就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就是估计充分、完全转变过来的结果。它概括了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基本内容，又体现了“国际电报”的新精神，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立。

在适时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对蒋方针问题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9月15日至17日举行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会议报告指明：“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采取

^① 见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该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报告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出新的解释：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同情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上面。报告还特别强调党要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简称《民主共和国决议》）。这个决议在准备进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策略转变，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既能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实际出发，灵活主动地放弃“抗日反蒋”口号，确定采取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方针，又能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批评，纠正策略思想上的某些不彻底处，创造性地提出“逼蒋抗日”的新口号，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成熟。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一个以“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阶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决定性一步

非常遗憾，中国共产党改变对蒋策略、倡议国共合作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当两广事变平息，蒋又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为促使蒋氏改变“剿共”政策实行抗日救国，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怎样处置这个突发事件，一时间成为国内外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当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逼蒋抗日”的方针，力主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党中央总书记张闻

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① 由于事发突然,各方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关于如何看待与处置这一事件,常委内部存在不同看法和主张,这是正常的。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倾听了报告和讨论后作最后发言,论述西安事变暴露的主要矛盾和我党应该采取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张、杨在西安的这一“突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和“民族妥协派”的矛盾。事变的意义是“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因此,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应该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向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党的工作“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张闻天认为,常委扩大会议上报告和讨论的意见中有两点是不妥当的。一是在政权问题上,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政府,领导全国抗日;一是在对蒋处置问题上,主张反蒋,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认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那方面,都有好处”。张闻天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指出,张、杨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政府”,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于对蒋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明确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既然对妥协派和正统要“尽量争取”,自然不赞成“审蒋”、“除蒋”这类恢复“反蒋”方针的处置办法。

张闻天的最后发言阐明了党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的策略思想。不过,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是按照“以西安为中心”与“审蒋”的思路来处理的。但事态的发展与各方态度的明朗很快

① 以下叙述12月13日会议材料据《张闻天传》,第397—399页。

就证明这样来处理西安事变是行不通的。中共中央 18 日发表的《致国民党中央电》，表明“和平调停”已经成为整个中央领导集体统一思想和处理方针。

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毛泽东作报告，首先着重分析了事变影响的两重性：光明的方面是“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黑暗的方面是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与延长的危险。又进而分析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胜利的前途或失败的前途。说明我们的策略应用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一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他强调现在更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党的策略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① 张闻天发言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并作了不少发挥和补充。^② 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处理的方针是“争取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他坚定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强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对事变发生后“审蒋”的主张提出批评：“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把“两手”策略概括为“和平调解”与“防御战”，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张闻天还对苏联的态度^③ 表示看法。一方面解释苏方对张、杨严厉指责有其难言之隐，“只能这

① 据毛泽东 1936 年 12 月 19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据张闻天 1936 年 12 月 19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③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于 16 日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的电文迟至 20 日才到，而苏联报纸 14 日起对张、杨横加指责。

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①

19日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21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提出同蒋等“开诚谈判”的六项条件。要求在这六项条件下“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达到“中国统一，一致抗日”。19日会议及产生的两个文件，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总体方案，21日电报则决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放蒋”。

西安谈判的顺利进行与蒋介石的安然离开西安，诚然是国内国际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一个关键性的力量，而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正确方针和中央书记处21日致周恩来电所提谈判条件与“放蒋”方针，则起了决定性作用。

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以后，由于蒋对张学良先审后扣，亲日派又派重兵进逼西安，一时间，西北上空战云密布，国内和平又受威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客观分析形势，把握全局动态，提出正确对策。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提出目前采取文武两手的对策：一方面“速发拥蒋迎张通电”，敦促蒋出来制止内战；一方面“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红军与张、杨“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

^① 据张闻天1936年12月19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不敢猛进”。^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还分别致电白区党负责人冯雪峰、潘汉年(上海)和刘少奇(北方局),要他们设法敦请或策动各方调停,维持国内和平。

不仅如此,在内战危机迫在眉睫,西安形势十分险峻的时刻,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于1月27日亲自秘密到达西安,同周、博共商解决内战危机的办法。28日又到云阳我前敌总指挥部,商讨对策。之后,即致电毛和周、博建议:红军主力“向渭北方面撤退”,由朱、毛发表谈话,主张团结御侮,反对新的内战;表示红军愿服从南京中央政府指导,同时“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当时西安方面与中央军的潼关谈判已有成议,按此协议,东北军将在七天内把渭河南岸的部队撤到北岸。红军主力北撤的行动,是一种与友军相呼应的、以退为进、争取主动的高明策略。

这时,西安方面和战之争更为激烈。由于蒋介石软禁张学良并置共产党和西安方面迭次释张返陕要求于不顾,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②,主张同中央军决一死战。29日后,东北军主战派控制局面,形成不论红军参加与否东北军都要决战的态势。在此内战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周、博等于30日下午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和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共商对策。经再三权衡,决定改变即使打起来红军也不参加的方针。当夜22点,与会者联名电告在后方的毛、朱等人。24点,毛、朱等人复电赞同,提

① 此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② 指蒋介石于1月9日提出的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种谈判方案。甲案大意是“东北军入甘,十七路军驻陕,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西安和陇海线”。乙案不同处主要是十七路军设防甘肃,东北军东移河南、安徽,“三位一体”就自然解体了。

出以“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①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31日举行的三方(东北军、西北军、红军)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保持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放蒋”以后为争取国内和平、遏制内战危机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不仅充分表现了中共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勇敢无畏，而且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广阔胸襟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的成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跨入一个新阶段。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表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②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解决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况，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 1937年1月30日夜云阳与延安之间党中央领导人的来往电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② 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共同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中共愿作出的四项保证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仍然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仍然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①,所通过的决议也叫做《根绝赤祸案》。这就决定了从重开谈判到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还要经过很多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

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持续了半年时间,经历了五个主要回合——2、3月间,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持续一个月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杭州的首次会谈;6月上旬至中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的再度会谈;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于7月15日上庐山同蒋介石第三次会谈;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的第四次会谈。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张闻天则自始至终领导着谈判的进行。

国共合作谈判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前方的周恩来正面交锋,机警坚定;后方的毛泽东、张闻天指挥若定,进退自如。都表现了过人的智慧,高超的斗争艺术。当8月周恩来、朱德、博古在南京谈判时,正值“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大势所趋,蒋介石只得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潮流,作出让步。国共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转引自《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页。

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根据国共双方商定，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准备抗战的阶段跨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国共合作谈判的成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在取消名义、接受改编和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保持了党对红军和苏区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是中国人民取得八年抗战辉煌胜利的光辉开篇。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不惜抛弃前仇，放弃红军、苏区名义，接受改编，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同时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使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置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不仅使国民党、蒋介石溶共、限共的政策归于失败，而且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自觉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

贯彻。党中央在晋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①从两年间召开的会议、发表的文电,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的战略、策略的转变及其制订的方针、政策,清楚地说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克服了将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幼稚,善于把国际指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这是成功的根本保证。

第三,在实际斗争中认清最主要的敌人和最主要的联合对手,实行策略转变。首先是认清最主要的敌人,把打击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都在统一战线联合的范围以内。关键还在于对蒋方针。中共中央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采纳张学良的建议,在对蒋介石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的基础上,确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因此,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总代表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的主要对手,对其政策应该是揭破其欺骗,推动其动摇,即迫使他向抗日的方面转变。这样,中国共产党对蒋方针就确定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同时应该看到,国共合作的形成也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在客观形势的变化直接威胁蒋氏所代表的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利益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地方实力派抗日要求的逼迫下,蒋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其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某种情势下甚至还采取一定的主动,在谈判中在坚持其立场的同时也作出一定的让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是建立在维护民族根本利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基础之上的。

^① 张闻天 1936年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以《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引文见该书第82页。

第四,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并广泛联合各派各军的力量,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坚强后盾。红军落脚陕北之际,中共中央就提出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确定联合东北军的方针,并很快做出过黄河东征的决策。东征取得胜利回师以后,又战胜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与此同时,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在西北形成一股巨大的共同抗日的武装力量。通过白区工作,同各派各军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所有这些,都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重视共产党,不得不将共产党作为主要谈判对手,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的重要原因,也是“逼蒋抗日”方针得以见效的强大物质基础。

第五,紧跟形势发展,抓住时局变化带来的有利时机,灵活变换策略,促使抗日统一战线取得进展。在1935年秋冬以来的两年里,接连发生了华北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等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些事变带来的时局的巨大变化,正确认识其性质、矛盾和发展趋势,掌握主动,因势利导,灵活变换各种姿态,运用各种策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向抗日的方向发展,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第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合作,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党内矛盾,纠正自身错误,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发生过对于主要敌人认识不够集中,对于联合的主要对手认识估计不足等问题;在战略策略的运用,方针政策的改变等方面,在其领导集体内部也产生过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可贵的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实践中探讨和寻求解决的办法,及时纠正认识的不足和偏差,调整党的策略方针,在克服党内矛盾、解决意见分歧的过

程中,在指导统一战线工作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使党和人民武装巩固和壮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致胜的决定性原因。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不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光辉的一页。重温这一段光辉的历史,我们要认真吸取其丰富的宝贵经验,发扬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共同合作的优良传统,所有炎黄子孙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作者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

《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2005 年 7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宅巍著的《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40.3 万字。该书分十章论述、探讨了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多重关联、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与时空范畴、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历史地位、性暴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位置与特点、新发现的埋尸资料及其诠释、民众的抵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界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并附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搜集的日军暴行记录 470 件。